

《朝鲜馆译语》考论

李 忠 辉

内容摘要:《朝鲜馆译语》为《华夷译语》的一种,成书于十六世纪中叶,系明代鸿胪寺所辑,曾用于明末鸿胪寺朝鲜通事之培养。清代虽也设“朝鲜译学”、“韩语学堂”培养朝鲜通事,但并未使用《朝鲜馆译语》。“朝鲜译学”所用教材为高级朝鲜通事自行编撰的汉、满、朝三种语言互译教程,“韩语学堂”所用教材为朝文版《通文馆志》。

关键词:朝鲜馆译语 朝鲜通事 鸿胪寺 中朝翻译

《朝鲜馆译语》是《华夷译语》中的一种,系出于培养朝鲜通事而编撰的中朝两种语言对译辞书。该书按天文、地理、时令、花草树木、动物、宫室、器用、人物、身体、衣服、声色、珍宝、饮食、文史、数量等类别,共收录了五百九十多条词汇与句子。作为《华夷译语》的一种,《朝鲜馆译语》的使用问题一直备受国内外史学界关注。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在考证《近藤正斋全集》(正斋目睹本)中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暹罗、占城、满刺加、鞑靼、回回、女直、畏兀儿、西番、百夷”等十三馆译语后,发现这十三馆全部在《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所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国、暹罗、占城、爪哇、苏门答刺、满刺加、鞑靼、回回、女直、畏兀儿、西番、河西、缅甸、云南百夷”^①等四夷一十八处通事之内。而就这里的十八处通事,马伯乐认为他们隶属于明会同馆。基于此种判断,马伯乐将《近藤正斋全集》中的十三馆译语视为明会同馆内通事学习外语所用^②。

此后,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依据马伯乐上述主张,对现存莫理逊所藏明抄本(伦敦大学本)、正斋目睹本、《汇刻书目外集》所载本、河内本、稻叶氏本、水

①《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各国通事》,中华书局,1989年,第587-588页。

②Par Henri Maspero,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12 (1912), pp.7-8.

户本、《孝慈堂目》所载本、阿波图文库本、静嘉堂本^①等《华夷译语》进行考证后,提出了著名的“甲、乙、丙”种本《华夷译语》说。其中,将包括《朝鲜馆译语》在内的十三馆译语命名为“丙种本”,即明“会同馆本”,辑于明末^②。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又依从马伯乐与石田干之助之观点,对《朝鲜馆译语》进行单独考证后,发现上述莫理逊所藏明抄本、水户本、稻叶氏本、阿波图文库本皆为同一版本,且也认同《朝鲜馆译语》为明会同馆内的外语类教材这一主张,但认为其辑于明中叶^③。上述国外学者的观点也影响我国,如黄有福、冯蒸等依从石田干之助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包括《朝鲜馆译语》的十三馆译语为“会同馆本”,是明清两代会同馆通事编纂的汉朝对译辞书。在成书时间上,黄有福依从韩国李基文等研究,认为是明初^④。刘红军与孙伯君则认为明会同馆“为便于各馆通事学习诸国语言”编写了包括《朝鲜馆译语》在内的十八国译语,而非十三国译语,主要用于“口语通译”^⑤。

如上所述,百年以来,就《朝鲜馆译语》的使用时间、使用场所与人员等问题,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果显著。时至今日,学术界虽对《朝鲜馆译语》成书时间仍有不同见解,但对其使用场所、人员等基本形成定论,即将《朝鲜馆译语》视为“会同馆本”十三馆译语中的一部,与其他十二馆译语一并视之,认为其为明代会同馆编撰,曾用于明清两代会同馆朝鲜通事学习朝鲜语。然查阅《明史》与《明会典》等史料,发现明会同馆职官设“会同馆大使、副使、大通关大使、副使^⑥、医生^⑦、馆夫、库子^⑧”等,并未设通事或朝鲜通事。然《朝鲜馆译语》何来“会同馆”朝鲜通事使用一说?如此,《朝鲜馆译语》的用途仍有不明之处。史料显示,《华夷译语》出于培养通事所辑,其内各语种译语的成书时间,以及通事的设置、来源、培养与所用教材等,与该译语的使用场所、人员、时间等密切相关。作为《华夷译语》的一种,《朝鲜馆译语》的用途也需基于此种维度去推敲考证。

①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史料》,桑原博士还历纪念祝贺会编:《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弘文堂书房,昭和六年(1931),第1288页。

②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史料》,桑原博士还历纪念祝贺会编:《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第1277页。

③小仓进平:《朝鲜馆译语译释(上)》,东京:《东洋学报》1941年第28卷第3期,第362页。

④黄有福:《介绍一种古代朝鲜语资料——朝鲜馆译语》,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21页。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年第2期,第57页。

⑤刘红骏、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49页。

⑥《明史》卷七二《志第四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第1751页。

⑦《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各国通事》,中华书局,1989年,第587页。

⑧《明会典》卷一四五《会同馆》,第735页。

一、《朝鲜馆译语》的成书时间

有明至清,我国与周边政权及世界各国间的交往极为频繁,使臣往来络绎不绝。为“译文字,通夷情”^①,明清两代一直在培养各语种通事。既然培养通事,就需有相关语言教材。《朝鲜馆译语》便是出于培养朝鲜通事而辑。因无明确史料记载,《朝鲜馆译语》的成书时间一直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迄今,虽国内外学者在此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未给出明确定论,需进一步推敲论证。当前国内外研究中,关于成书时间主要有三种主张。

一是明初说。该主张依据《朝鲜馆译语》所载朝鲜语语音的出现先后时间,认为该书成书于明初。如李基文认为,首先该书名称为《朝鲜馆译语》,而非《高丽语译语》,成书时间应为1392年朝鲜建国之后。其次,因该书中出现的部分朝鲜语语音为《训民正音》出现前,因此成书应于1443年之前。又依《琉球译语》部分内容的编撰时间为明永乐帝时期这一说法,推断《朝鲜馆译语》为明永乐帝时期会同馆编纂^②。此种观点亦得到文璇奎^③的支持。我国学者黄有福也受此种主张影响,认为《朝鲜馆译语》可能成书于明初,其列举的理由有二:一是《译语》中保留有元代高丽语,二是《译语》中的一些词语与《鸡林类事》中的宋代高丽语相同^④。

二是明中叶说。小仓进平在对莫理逊所藏明抄本《华夷译语》十种译语进行研究时,发现该版本中《日本馆译语》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一月望,通事序班胡滂、褚效良、杨宗仲校正”,《满刺加译语》中有“嘉靖二十八年日,通事杨林校正”等内容。小仓进平依此,主张包括《朝鲜馆译语》在内的“会同馆本”《华夷译语》应为十六世纪中叶成书^⑤。

三是明末说。石田干之助认为该书编撰时间为明末,其主要依据为该书中有茅瑞徵撰、朱之蕃序等内容,而茅瑞徵、朱之蕃二人均为明末官员^⑥。此外,清王闻远《孝慈堂书目》所载《十国译语》中,有编写各国译语的官员姓名。据该书所载,毛寅负责朝鲜语、满刺加语、占城语,李广元负责西番语,吴之任负责琉球语,李遇阳负责鞑靼语,杨振负责日本语,叶宏纶负责百夷语,杨日负

①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岳麓书社,1998年,第26页。

②李基文:《新订版国语史概说》,首尔:太学社,1999年,第122页。

③文璇奎:《朝鲜馆译语攷论——以编成时期、表记法及音韵为中心》,首尔:《亚洲研究》1962年第5卷2期,第226页。

④黄有福:《介绍一种古代朝鲜语资料——朝鲜馆译语》,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421页。

⑤小仓进平:《朝鲜馆译语语释(上)》,东京:《东洋学报》1941年第28卷第3期,第369-372页。

⑥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史料》,桑原博士还历纪念祝贺会编:《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第1277页。

责暹罗语、委兀儿女语等,凡十种译员^①。此处,负责《朝鲜馆译语》的毛寅曾担任过明末礼部主事,负责提督会同馆,1632年负责接待过朝鲜使臣金堉。吴之任为鸿胪寺序班,曾于1632年接待过朝鲜使臣洪镐。因此,也有部分学者依此认为,《孝慈堂书目》中的《十国译语》应为明朝末年编撰,其中也包括《朝鲜馆译语》。

上述研究中,以《朝鲜馆译语》所载朝鲜语语音出现先后为依据,提出的“明初说”值得推敲。首先,该书编撰者并非一定为地地道道的朝鲜人,很可能是生活在中国的朝鲜人。据史料记载,自唐代起,朝鲜人就已经聚居于中国辽东地区,且保存着原有的语言风俗,这说明他们的语音可能保留前代语音。其次,《朝鲜馆译语》所录单词中有前代语音,仅能认定其为前代以后所撰。而“明末说”的论据也略显单薄。根据史料,《朝鲜馆译语》的编撰者先后有茅瑞徵、毛寅等二人,此二人均为明末官员,又非通事出身,不懂朝鲜语,绝非该书编者,应是该书不同时期的整理者。由此也可推断,该书成书时间应在此二人之前。

我国史料较早提及《朝鲜馆译语》的为《皇舆考》,据该书记载,“其译语,呼天为哈嫩二,地为大,日为害,月为得二”^②。而《朝鲜馆译语》第一部分天文门中,前三个词就是“天为哈嫩二,日为害,月为得二”,第二部分地理门第一个词为“地为大”^③。《皇舆考》中的这部分译语内容与《朝鲜馆译语》的编撰体例及内容一字不差,完全相同。而宋朝孙穆所撰的《鸡林类事》中,“天曰汉(木奈),日曰姁,月曰契(黑隘切)”^④,”地”未出现于该书。因此,从上述单词的编撰体例与内容上看,张天复编撰《皇舆考》时,必定参照过《朝鲜馆译语》,而非《鸡林类事》。即《皇舆考》中所提“译语”便为《朝鲜馆译语》。《皇舆考》的成书时间在1557年,由此可知《朝鲜馆译语》的成书时间应在1557年之前。

并且,《皇舆考》还为较早提及十三馆通事之我国史料,其书中云设十三馆通事,“译其语音,礼部辖之。设四夷馆,译其文字。太常寺少卿提督,亦礼部辖之。十三馆曰:朝鲜、琉球、日本、暹罗、安南、满刺、百夷、鞑靼、(女直)、委兀儿、西番、回回、占城等国通事”^⑤。此后,《登坛必究》也有相同内容之记载^⑥。

①王闻远:《孝慈堂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189页上栏。

②张天复:《皇舆考》卷一〇《四夷》,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3册,第374页上栏。

③小仓进平:《朝鲜馆译语语释(上)》,东京:《东洋学报》1941年第28卷第3期,第369-372页。

④孙穆:《鸡林类事》,见陶宗仪《说郛·卷第七·鸡林类事》,中国书店,1986年,第32页。

⑤张天复:《皇舆考》卷一〇《四夷》,第371页上栏。

⑥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二二《四夷总图序》,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1册,第72页下栏。

依《皇輿考》与《登坛必究》的成书时间,包括朝鲜馆通事在内的十三馆通事也应设于1557年之前。朝鲜史料亦有佐证,嘉靖二十六年十月(1557),明礼部主客清客司主事余田给朝鲜的帖文中云:“惟恐今次到京人员等,未知前事,恐蹈前辙,深为未便。为此帖仰朝鲜馆通事序班洪惠等。”^①该条史料为最早提及“朝鲜馆通事”之朝鲜史料,其时间与《皇輿考》的成书时间也为同一年。并且,《皇輿考》所云十三馆通事与正斋目睹本、《汇刻书目外集》所载本、河内本、阿波图文库本等十三馆译语中的十三馆完全相同^②,表明十三馆译语为十三馆通事所用,应为设十三馆通事后所编。

综合上述史料与研究认为,《朝鲜馆译语》成书既然在1557年之前,关于朝鲜馆通事等十三馆通事的史料也出现于1557年之前,且我国与朝鲜此前史料中又未出现过朝鲜馆通事之记载。所以,该书的成书时间应与《日本馆译语》及《满刺加译语》的编撰时间“嘉靖二十八年(1549)”相符,在十六世纪中叶,符合小仓进平提出的“明中叶说”。而明末的茅瑞徵、毛寅等不懂朝鲜语,均非《朝鲜馆译语》最初的编撰者,或为该书后来的整理者。然关于该书由何人于何处使用等问题,国内外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需通过明清两代朝鲜通事人员的设置、来源、培养与所用教材等加以考证。

二、明清两代朝鲜通事的设置与来源

《朝鲜馆译语》作为《华夷译语》的一种,其编撰目的与《华夷译语》相同,是为朝鲜通事学习朝鲜语。如此,该书的使用场所应为明清两代朝鲜通事的设置机构,使用者应为明清两代朝鲜通事。然明清两代中央外事机构多设通事,且有重叠设置之情况,导致后世学者对朝鲜通事设置的认识多有混淆之处,认为该书为会同馆或四夷馆等机构使用。因此,需考证明清两代朝鲜通事之设置情况。《朝鲜馆译语》的使用者应为朝鲜通事,然朝鲜通事是否精晓朝鲜语,有无使用该书学习朝鲜语之需?此问题则需通过对明清两代朝鲜通事的来源等进行推敲考证。

(一)明清两代朝鲜通事的设置

明清两代,为接待朝鲜使臣,我国均设有朝鲜通事。“(洪武)三十年,始改为鸿胪寺,升秩正四品,设官六十二员。卿以下员数、品级如前所列。又设外夷通事隶焉。”^③此处外夷通事之详情,据《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各国通事》:“凡通事额员,成化五年奏定,小通事额数,总不过六十名。遇有病故,及为事等项革去职役者,照缺选补。若事繁去处丁忧有过三名者,量

①《李朝明宗实录》卷二一,明宗十一年十一月丙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2册,第120页。

②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史料》,桑原博士还历纪念祝贺会编:《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第1277页。

③《明史》卷七四《志第五十·职官三》,第1802-1803页。

补一名,计四夷一十八处,额设通事六十员名。”四夷十八处为“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国、暹罗、占城、爪哇、苏门答刺、满刺加、鞑靼、回回、女直、畏兀儿、西番、河西、缅甸、云南百夷”^①。通事六十员名中设朝鲜国五员名。成化九年六月庚申,礼部上表称“鸿胪寺,四夷各国通事,额设不过六十人”^②。《礼部志稿》卷九二《限通事滥进》^③也有相同内容之记述。此外,正德三年冬十月丙子,鸿胪寺曾奏:“本寺职掌朝贡礼仪,故有司宾署十八国通事之设。”^④上述种种史料表明,明中前期鸿胪寺司宾署设有十八国六十员通事。然《皇輿考》、《登坛必究》、《礼部志稿》等史料显示,“诸通事虽属鸿胪,而其职务多在会同”^⑤。至明中叶,鸿胪寺所设各国通事已减少至十三馆,真腊国、爪哇、苏门答刺、西番、河西等五馆不见踪迹。至明末,鸿胪寺负责“宾客远人之事,十馆通事隶焉”^⑥,减少到了十馆。但无论是十八处,还是十三馆,或是十馆,其内均有朝鲜通事,表明明代朝鲜通事虽工作多在会同馆,但却设于鸿胪寺。除鸿胪寺外,明代还在中朝边境地区设有朝鲜通事负责接待迎送朝鲜使臣,但设于军队内,且人数较少^⑦。

因明代通事所设机构较多,互有重叠,学者对各语种通事的隶属也有不同主张^⑧。关于明代朝鲜通事,后世研究者多主张其隶属于会同馆或四夷馆。然明会同馆隶属兵部车驾司,其职官有“会同馆大使、副使、大通关大使、副使、医生、馆夫、库子”等,并未设朝鲜通事。马伯乐等学者将《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下的《四夷通事》划归于《礼部六十七·宾客·会同馆》条下,这成为会同馆设置并培养朝鲜通事之重要依据之一。如本文前述,“正斋目睹本、《汇刻书目外集》所载本、河内本、阿波图文库本”等中的十三馆,与明中叶以后成书的《皇輿考》、《登坛必究》、《礼部志稿》等史料中的鸿胪寺“十三馆”设置完全相同。而明四夷馆,自永乐五年起,为“译文字,习译语”,先后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百馆、暹罗馆^⑨等十馆通事。四夷

①《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各国通事》,第587-588页。

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七,成化九年六月庚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第2255页。

③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二《限通事滥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8册,第682页。

④《明武宗实录》卷四三,正德三年冬十月丙子,第993页。

⑤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一《天方国》,中华书局,2000年,第396-397页。

⑥杨尔绳:《鸿胪寺志略》卷四《职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1年。

⑦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⑧廖大珂、孙魏:《明代四夷馆初探简》,《史林》2016年第4期,第83页。

⑨《明史》卷七四《志第五十》,第1797页。

馆虽设十馆,分掌三十餘国^①。其中,既无朝鲜馆,也未设朝鲜通事。且明代与朝鲜王朝间的往来文书均用汉字书写,亦无需朝鲜语笔译人员。

清会同四译馆负责“掌治宾客,谕言语”^②,其下设各国通事。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③。为接待朝鲜来使来访,清初于四译馆内设朝鲜通事。康熙十三年又额定朝鲜通事职数,“上三旗,六品三员,七品二员,八品一员;下五旗,六品三员,七品二员,八品一员。上三旗由内务府带领引见,下五旗论俸推升”^④。乾隆十三年,将四译馆入礼部,与会同馆合二为一,称会同四译馆,其下设为二馆:曰西域,曰百夷。乾隆二十三年,因“朝鲜每年往来,礼节言语,俱已熟悉,所有通官,似可毋庸多设。省六品四人、七品二人,增八品二人”^⑤。即,乾隆二十三年以后,会同四译馆设“朝鲜通事官八人,六品、七品各二人,八品四人”^⑥。由此可知,清代朝鲜通事设置较为清晰,初设于翰林院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后,置于会同四译馆。此外,清朝在中朝边境凤凰城与驻朝鲜总领馆等处也设朝鲜通事^⑦。

(二)明清两代朝鲜通事来源

有明至清,我国与朝鲜关系密切,双方使臣往来络绎不绝。在这种密切交往背后,朝鲜通事不可或缺。关于明代朝鲜通事的来源,《辽东志》载:“按辽东例有朝鲜女直通事,送四夷馆,以次铨补鸿胪官,旧止用东宁卫人,盖取其族类同、语言习也,比来各卫亦成有为之者矣。”^⑧《全辽志》亦云:“按辽东例有朝鲜女直通事,送四夷馆,以次铨补鸿胪官,止用东宁卫人,盖取其族类同、语言习也,比来各卫亦成有为之者矣。”^⑨这条史料显示明代朝鲜通事由辽东地区在朝鲜人中保举。关于明代边疆地区保举通事一事,据载:“弘治八年,奏准各国世业并土官人子孙情愿告充候缺通事或边方访保生儒人等,该本部考得番语精通,勘无诈冒者,札送鸿胪寺,收充候缺通事。”又,“嘉靖元年,奏准通事丁忧,缘事未结,俱不作缺,其有见缺十人以上,及一国全缺者,照旧行各边镇巡官访保精通番语,身家无过,人物齐整,字画端楷,语音洪亮者,每缺起送二人前来

①《四夷馆考》,甲子寅六月,东方学会印本,季羨林、许丽华主编:《我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册,第54-79页。

②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3283页。

③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四,第3283-3284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五六〇,中华书局,1986年,第16册,第102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五六〇,第102-103页。

⑥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四《志·八九·职官一》,第3283-3284页。

⑦李忠辉:《汉至清代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及活动研究》,《东疆学刊》2017年02期,第11页。

⑧任洛:《辽东志》卷六,《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史部,上海书店,1994年,第707-708页。

⑨李辅:《全辽志》卷三,《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史部,第865-866页。

补考”^①。综合上述史料可知,有明一代,辽东地区的朝鲜人多精晓朝鲜语,“盖取其族类”做朝鲜通事。

在《辽东志》卷六《人物志·通事》条下,列有明代辽东地区向鸿胪寺保举的十二名朝鲜通事。这十二名朝鲜通事具体情况如下:成化年间,吴泰,山东人,保充通事,历升礼部侍郎,掌鸿胪寺事;李翔,东宁卫人,保充通事,历升前军都督府经历。弘治年间,崔荣,东宁卫人,保充通事,升鸿胪寺主簿;李钦,东宁卫人,保充通事,升鸿胪寺主簿;李时,东宁卫人,保充通事,授席班(“序班”误写)。正德年间,李时享,东宁卫人,由通事升至随堂;胡朝阳,定辽左卫人,由通事授鸿胪寺序班;李承芳,东宁卫人,由通事授序班;赵文用,东宁卫人,由通事授序班。嘉靖年间,李承华,东宁卫人,由生员充通事;李时贞,东宁卫人,由儒士选充通事;徐充,定辽中卫人,由儒士选充通事^②。上述史料也佐证了明代朝鲜通事多由辽东地区朝鲜人充任一事。

此外,明中前期,高丽或朝鲜出身的宦官懂朝鲜语,他们代表明朝出访朝鲜时,既是正使或副使,亦是朝鲜通事。如恭愍王十八年六月丙寅,“皇帝遣宦者金丽渊致书曰:适内使监丞金丽渊在侧。丽渊亦高丽人,尝言家有老母,久不得见。朕念其情,就令其行,并遂省亲之顾”^③;昌王即位年十二月,“帝遣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丽、普化等来求马及阉人。喜山等皆我国人也”^④;恭让王三年十二月甲子,“帝遣宦者前元承徽院使康完者笃等三人来”^⑤。上述金丽渊、喜山、康完者笃等均为高丽出身的宦官,在出使高丽时,可用朝鲜语与朝鲜人交流,兼任朝鲜通事一职。

清入关前后,朝鲜通事均由归顺满族八旗的朝鲜人及其后代充任。《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等史料载有大量归顺清朝的朝鲜通事的活动。如“朝鲜显宗十年七月甲寅,命平安监司输送大通官李一善、金巨军等所贸皮物。一善等以我国人为清国通官,专管我国事,随其喜怒,贻弊万端,朝廷畏知,凡有所请,不得不从”^⑥。又有“卞难者,亦我国贱隶,今于世子之行,称以大通官出来,

①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三六,第597册,第679-680页。

②任洛:《辽东志》卷六,第707-708页。

③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四一《世家四十一·恭愍王》,十八年六月丙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册,第1286页。

④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一三七《列传五十·昌王》,即位年十二月,第10册,第4142页。

⑤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四六《世家四十六·恭让王》,恭让王三年十二月甲子,第4册,第1398页。

⑥《李朝显宗实录》卷一七,显宗十年七月甲寅,第33册,第437页。

世子祇谒于宗庙而护行”^①。此外,“胡译郑命守,乃殷山县下人”^②。胡译郑命守就是清初朝鲜通事顾尔马浑,原名为郑命寿^③。上述李一善、金巨军、卞难、郑命守等均为清朝入关前后,被掳或归顺满族八旗的朝鲜人,在清朝充任朝鲜通事。清初之后,于满族八旗内各朝鲜佐领内选拔朝鲜通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在归顺清朝满洲各旗中,共有91名归顺的朝鲜通事^④。朝鲜洪大容也云:“盖诸通官,皆我国被掳人子孙也。”^⑤如此,清代朝鲜通事与明代不同,明代各朝从辽东生活的朝鲜人中选拔朝鲜通事,而清代则是子承父业,从清初加入满族八旗的朝鲜人子弟中选拔。

综上所述,明代朝鲜通事多由辽东地区居住的朝鲜人充任,置于明鸿胪寺。清代朝鲜通事则由满族八旗内朝鲜人充任,置于清会同四译馆。依上述史料,《朝鲜馆译语》的使用地点应为明鸿胪寺或清会同四译馆,使用人员应为明清两代朝鲜通事。然从明清两代朝鲜通事来源看,他们绝大多数为朝鲜人出身,应精通朝鲜语,貌似无使用《朝鲜馆译语》之需。如此,关于《朝鲜馆译语》的使用人员与时间,则需进一步考证。

三、明清两代朝鲜通事的培养与教材

史料记载,明代的四夷馆与鸿胪寺、清代的会同四译馆等都曾培养过通事人员。通过考察朝鲜通事的来源,发现似乎没使用《朝鲜馆译语》之必要。那么,为何又要编辑此书?因此,需要搞清明清两代有无培养朝鲜通事,是否使用过《朝鲜馆译语》作为教材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佐证《朝鲜馆译语》的使用人员及时间等。

(一)明代朝鲜通事的培养与教材

明代的朝鲜通事主要来源自辽东朝鲜人,他们从小生活在辽东朝鲜人聚集区,语言习俗基本与朝鲜相同。如朝鲜申叔舟在见闻录中称:“东宁卫人,其言语、衣服、饮食皆与我国同,而汉语则不能也。”^⑥虽然如此,但明代通事不用参加科举就可为官授品,所以有滥进情形。据《礼部志稿》卷九二《限通事滥进》记载,成化八年六月庚申朔,礼部言鸿胪寺四夷各国通事额设不过六十人,

①赵克善:《冶谷集》卷九,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化丛刊续》,首尔:东洋印刷株式会社,2006年,第26册,第243页。

②《李朝仁祖实录》卷二八,仁祖十一年十月辛巳,第31册,第72页。

③郑命寿的相关研究见杨海英:《朝鲜通事古尔马浑(郑命寿)考》,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63-267页。

④杨海英:《朝鲜通事古尔马浑(郑命寿)考》,第263-267页。

⑤洪大容:《湛轩燕记衙门诸官》,林基中:《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2册,第79页。

⑥《李朝成宗实录》卷五五,六年五月癸亥,第11册,第501页。

今滥进者数滥额外^①。因滥进者多,通事质量亦无法保障,甚至出现所学夷语不通达者。此种情况在朝鲜史料中有所记载,朝鲜官员崔簿于《锦南飘海录》云:成化二十四年四月(1488),“有徐序班者,忘其名,来点程保等具冠带,教以肃拜节次之礼,徐虽号称通事,不善解我国之语”^②。如此,在明代需要对通事进行培训,提高夷语能力。

为加强与世界各国之交往,明代不仅在四夷馆内培养译字生及通事,也于鸿胪寺中培养通事。据《礼部志稿》卷三六记载:“十九年,议准通事见缺访保送部收考,转送该寺教习者,俱不得过正额之半。”^③此处,“该寺”所指鸿胪寺,即选送保举通事送鸿胪寺学习也。又,“嘉靖元年,更定选补各国通事之法,除丁忧缘事俱不作缺,其见缺十人以上,及一国全缺者,在外行各边镇巡官每缺精选一人送部。在京不必行通事访,如四夷馆译字生事例,礼部札鸿胪寺召选真正籍贯俊秀子弟,取其印信,保结粘连送部,覆审相同,再行考试。每缺精选一人,奏送该寺,分派各国年深老成通事教习。如本国无人,许其自行从教师受业,或令邻邦通晓者教之一年”^④。上述两条史料清晰表明,明代鸿胪寺与四夷馆一样,具有“习译馆”功能,对从各地保举来的通事进行外语再教育。因朝鲜通事置于鸿胪寺,所以其培养也应于鸿胪寺中进行。

关于明鸿胪寺朝鲜通事培养一事,虽未见于我国史料,但朝鲜史料中有所记载。朝鲜出使明朝使臣黄汝一在《银槎录》中云: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1599),“己巳,朝阴午晴,夜大风,留玉河馆。朝早,序班陈以元、生徒高诩来馆曰:今日鸿胪寺以此不坐,不可呈奏文云云。二十五日,生徒韩承勋、高诩等来馆请见奏本”^⑤。朝鲜史料中负责传语的明代序班,为朝鲜通事。如朝鲜司谏院大司谏金碯等曾在疏称:“盖译官在中朝为序班,在我朝为通事。”^⑥《银槎录》中,黄汝一称序班韩承勋、高诩二人为生徒,意指其二人为朝鲜通事“生徒”^⑦。《银槎录》载,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郎中臧尔劝对朝鲜使臣曰:“你国(朝鲜)序班尽为差出未还,现在者又皆未升实差。”^⑧该史料也佐证了高诩与韩承勋系未授品衔的朝鲜通事“生徒”,表明其二人是通过朝鲜语学习,待升序班者。因韩承勋与高诩隶属于鸿胪寺,亦可知明代鸿胪寺中曾对朝鲜通事进行培训,教师为精通朝鲜语的“老成通事”。现存史料虽无使用教材之

①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682页。

②崔簿:《锦南漂海录》,林基中:《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册,第522页。

③俞汝楫:《礼部类稿》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680页。

④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二,第598册,第684页。

⑤黄汝一:《银槎录》,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8册,第322-324页。

⑥《李朝成宗实录》卷一一七,成宗十一年五月甲申,第12册,第434页。

⑦李恒福:《朝天日乘》,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8册,第487页。

⑧黄汝一:《银槎录》,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8册,第409页。

相关记载,但鸿胪寺十三馆通事与“会同馆本”十三馆译语完全重合,表明这十三馆译语为鸿胪寺十三馆通事编辑使用,因此,其教材应为《朝鲜馆译语》。

此外,朝鲜文人朴趾源曾云:“皇明时,选朝鲜俊俏火者,教习黄门高丽语。”^①该史料表明,元明两代朝鲜出身的宦官曾在宫中传授朝鲜语。亦有出使我国的朝鲜使臣教授我国人朝鲜语的记载。中宗三十四年十一月乙卯,“典籍朱良佑(随使臣出访明朝期间)以谚字教诲上国之人,所馆重大,请推鞠重论”^②。但这些学习都属个人行为,规模较小,或无教材。

(二)清代朝鲜通事的培养与教材

清朝入关前后,与朝鲜王朝交往主要依靠被掳归顺的朝鲜人,由他们充任朝鲜通事,负责语言沟通交流。入关后,随着归顺一代朝鲜人的逝去,他们的通事职位由后代接替。部分世袭的朝鲜通事因语言生活环境限制,朝鲜语水平低,难以适应翻译工作。朝鲜史料对清代朝鲜通事的翻译水平有较多记载。如《承政院日记》卷七八记载:正祖一年,“丁酉三月十六日午时,上御兴政堂。(中略)上曰:今番迎劄时,非但通官之不能通语,我国译官亦不成说矣”。^③这里的通官为清朝朝鲜通事,译官为朝鲜王朝的通事。此外,朝鲜出使清代的使臣也较详尽地记述了清代朝鲜通事的朝鲜语语法能力,“中国通官,亦对使臣,或作你汝语,对驿卒辈,亦作极尊敬之称,足令人捧腹”^④。该记载表明清代朝鲜通事完全不懂朝鲜语敬语法。又如,(1865年)“二十七日丙戌,通官六人来候三使,强作东语,而全似小儿学语,比之东译汉语,不啻不及”^⑤。如此,清朝不得不开设学堂专门培养朝鲜通事。“乾隆十六年,奏准嗣后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于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用心学习,于见(现)在谙晓译语通官内选择二人教习。凡通官员阙,由部当堂考试,于应补旗分内择精熟者充补,如学习日久不能谙晓者,发回该旗别行咨取。”^⑥上述史料显示,在乾隆十六年,清朝在会同四译馆内设立“朝鲜译学”。“朝鲜译学”的学员从满族八旗下五旗的朝鲜人子弟中选取,具有世袭性质。朝鲜使臣洪大容笔下描述的徐宗顺、徐宗孟、徐宗显,乌林哺、其子双林、其弟乌商,朴宝玉、朴宝树等清代朝鲜通事间的血缘关系^⑦,也佐证了清代朝鲜通事的世代传习之特征。

①朴趾源:《热河日记》,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54册,第611页。

②《李朝中宗实录》卷九二,中宗三十四年十一月乙卯,第20册,第202页。

③《承政院日记》第1396册,第117页。首尔大学奎亭阁藏书。

④徐长辅:《蓟山纪程》卷5《附录·言语》,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66册,第597页。

⑤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编[二]》《五花沿笔》,林基中:《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94册,第312页。

⑥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五《礼部·主客清吏司·宾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22册,1986年,第951页。

⑦洪大容:《湛轩燕记衙门诸官》,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42册,第65页。

此外,清末政府为培养所需朝鲜语翻译人才,“以备翻译之选”^①,于1892年,由袁世凯负责在朝鲜汉城公署开办“韩语学堂”。该学堂为两年制,第一期学生分别从当时的电报学堂与商家子弟中各选5人^②,教授朝鲜语。此“韩语学堂”为我国近代第一所专门培养朝鲜通事的教育机构。

关于“朝鲜译学”内使用的教材,现存史料中未发现直接记述。然朝鲜使臣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记有朝鲜通事双林学习朝鲜语一事。“双林始学鲜话,皆模糊不可听。示一卷书,云是徐宗孟作,上有汉语,下以满语及鲜语解之,各以其谚书之。仍与论其误处,余仍以汉语及汉音质之,双林并欣然答之。”^③该史料表明,清代朝鲜通事双林刚开始学习朝鲜语时,所用教材由徐宗孟编撰,分别用满语和朝鲜语两种文字注解汉语,是一种汉、满、朝三种语言互译教材。这种教材的编制符合当时清朝与朝鲜的交往要求。“出使外国:顺治初年朝鲜用满官,安南、琉球用汉官;康熙二十三年,安南、琉球等国兼差满汉官,由院开职名,移咨礼部,题请钦定。”^④虽出使朝鲜,清朝一直以满族八旗出身大臣为正使,但也会派汉官随访。满族入关后,也渐渐习会了汉语。所以,这就要求朝鲜通事需要懂得满语、汉语、朝鲜语三种语言,徐宗孟的这本教材应在此种需求下编撰。

关于教师徐宗孟,洪大容曾云:“徐宗孟六品大通官,自其兄宗顺,久执使价之权,名震东方。宗顺死,宗孟承其馀业,性又摯悍贪欲,善朝鲜语。”^⑤其兄徐宗顺,据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六日盛京侍郎纳尔泰奏称,“圣恩将徐宗顺暂时赐以六品衔以示教励,仍食八品俸”。原凤凰城两名朝鲜通事“俭尔泰与林布即交徐宗顺怠教习,限二员预期通晓朝鲜言语,倘预期仍若不能即晓,资部另选通晓朝鲜言语人员补放”^⑥。上述史料表明,因徐宗顺、徐宗孟兄弟二人精晓朝鲜语,均为六品最高品衔通事,且都担任过朝鲜语教师,徐宗孟还编撰过朝鲜语教材。

上述史料表明,清代朝鲜通事所用教材由高级通事编撰,且因清中前期满族官员多讲满语,这种教材为汉、满、朝三种语言互译教程。而《朝鲜馆译语》仅为汉朝两种语言对译辞书,无法满足清代中前期翻译需求,料想并未被作为教材使用。1780年,出使清朝的朴趾源也遇到了双林,此时双林虽已作为朝鲜

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第3021页。

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022-3023页。

③洪大容:《湛轩燕记衙门诸官》,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42册,第79页。

④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53《翰林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25册,1986年,第52页。

⑤洪大容:《湛轩燕记衙门诸官》,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42册,第65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八品通事徐宗顺请赐六品衔留凤凰城办事》,《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7页。

通事工作十多年,但仍在学习朝鲜语。不过这次他使用教材是一本用朝鲜语翻译的小说,叫《刘氏三代录》。朴趾源测试了一下双林朝鲜语能力,则“双林摇身高声,而全未属句,混沦读去,口棘唇冻,呕出无数衍声。吾良久听之,茫然不识为何语。渠虽终身读之,似无益矣”^①。而清末设于汉城的“韩语学堂”,所用教材则为朝鲜文版的《通文馆志》等^②。

如上,明代于鸿胪寺内培养朝鲜通事,时间在明末,使用教材虽无史料明确提及,但可推断为《朝鲜馆译语》。清代分别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和朝鲜总督府设立“韩语学堂”,专门培养朝鲜通事,使用教材为高级别通事自编的汉、满、朝三种语言互译教材或《通文馆志》,而非《朝鲜馆译语》。

四、结语

《朝鲜馆译语》的编撰目的在于培养朝鲜通事。依据《皇舆考》所载《朝鲜译语》及十三馆通事之内容,参考朝鲜史料与《日本馆译语》、《满刺加译语》的成书时间,可推断该书应编撰于十六世纪中叶。而明末官员茅瑞徵与毛寅不懂朝鲜语,非《朝鲜馆译语》的第一版编撰者,可能为该书不同时期的整理者。史料表明,虽然明代鸿胪寺朝鲜通事基本由居住于我国辽东地区的朝鲜人充任,但仍需于该寺内培养朝鲜通事。《朝鲜馆译语》成书后,因会同馆与四夷馆未设朝鲜通事,仅能用于明鸿胪寺朝鲜通事之培养。且据朝鲜史料,其作为教材使用时间应该在明末。此种结论亦表明,将该书归入“会同馆本”《华夷译语》,认为该书是明会同馆内朝鲜通事编撰使用之主张并无依据。

清朝入关后,满语与汉语一样,均为重要官方语言。在与朝鲜王朝的对外交往中,清代多派满族大臣出使朝鲜。此种情况对清代朝鲜通事要求相对较高,需要懂得汉、满、朝三种语言。虽清会同四译馆的朝鲜通事由被掳或归顺满族八旗的朝鲜人及他们的后人充任,但因部分朝鲜通事语言能力不高,仍需培训朝鲜语言。清代设朝鲜译学培训朝鲜通事,所用教材为汉、满、朝三种语言互译教材,由高级别朝鲜通事编撰。而汉朝两种语言对译的《朝鲜馆译语》无法满足当时需求,无法作为清会同四译馆教材使用。清末设于汉城的“韩语学堂”,所用教材则为朝鲜文版的《通文馆志》。因此,在清代,《朝鲜馆译语》可能仅为一种读物流传,如宋代的《鸡林类事》。综上所述,本文研究认为,《朝鲜馆译语》成书于16世纪中叶。该书于明代,仅用于明末鸿胪寺朝鲜通事之培养。清入关后,因汉、满、朝三种语言互译之需,该书无法作为教材使用。

【作者简介】李忠辉,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韩翻译史、韩国学。

①朴趾源:《热河日记》,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54册,第491-492页。

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021页。